

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管理学逻辑与核心命题

黄速建

摘要: 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民营企业是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一种组织形态,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以民营企业为载体的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有着特殊的管理学内涵,也有着环境共演性和制度依赖性。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需要具备“立得牢”“放得活”“管得住”“担得起”“撑得稳”“落得地”的功能,影响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制度原因是与正式制度变迁不同步的非正式制度以及制度执行。为此,需要解决制度同步性不足、制度效能一致性不足和制度功能误用等问题,建立健全增强民营企业发展公平性的基础性制度,提升民营企业发展能力的支持性制度,维护民营企业发展健康性的规范性制度,坚定民营企业发展信心的保障性制度,以及相应的有效、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并保障与正式制度基本同步的非正式制度供给。在制度的影响下,民营企业的动态能力具有灵活性、市场性、营利性、战略性以及自发的生态性等整体独特性。

关键词: 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的性质; 动态能力; 环境共演性; 制度依赖性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5.01.011

一、引论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①民营经济“56789”^②的特征反映了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作用。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③。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营企业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和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④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国家支持和企业家创业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的制度供给是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极重要外部动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⑤。

民营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着一定的困难与问题。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⑥,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本质上要求民营经济发展实现法治化、制度化,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使命和任务研究”(23ZDA036)。

作者简介: 黄速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sujian1126@126.com)。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页。

② “56789”即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③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6页。

④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页。

⑤ 朱斌、吕鹏:《中国民营企业成长路径与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⑥ 史晋川、任晓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支撑》,《国家治理》2023年第16期。

中存在着由于制度不完善带来的体制机制障碍,也遇到立法供给不足、多头执法随意执法重复执法、“四新经济”合法性难题、民营企业财产权益保护不足、行业自律功能缺位,以及合规建设发展迟滞等问题^①,还遇到传统观念的偏见、资金短缺、成本高企、市场开拓难度大、营商环境欠佳^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③、顶层设计薄弱、市场调控失序、社会责任意识偏弱^④、要素制约明显、发展的治理机制欠完善^⑤、产权保护层面的法律制度不健全^⑥等问题。生产要素、创新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错配,产业政策的资源配置功能发挥不足,尤其是在产业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对公平竞争规则重视不充分,且存在着一定的隐性歧视性政策^⑦。

从已有相关研究看,学术界多将民营经济作为研究对象,从多个层面研究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对于民营企业层面的高质量发展研究不够充分;对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管理学内涵未展开研究;缺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性质与功能的研究;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环境共演性的研究不足;对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依赖性研究不够深入。

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一种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实践要求,其管理学内涵是什么?围绕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管理学内涵,本文尝试回答四个核心命题:(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民营企业是什么?即民营企业是具有什么性质的组织?(2)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与运营环境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主要因素决定民营企业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民营企业能否实现高质量的高速度发展?(3)制度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影响?(4)外部制度影响下民营企业的动态能力是否具有整体独特性?

二、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管理学内涵

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与民营企业的战略管理实践要求、民营企业发展范式转变的实践要求密切相关的理论与政策研究命题,是从民营企业管理与发展实践中提出来的对其发展范式的一种目标性要求。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运营、发展的优劣程度即为企业发展质量,它反映了企业经营与发展过程中持续创造综合价值和持续成长的能力与水平。企业高质量发展则是企业依价值理性追求高水平、高层次、高效率的综合价值创造,并塑造卓越的企业持续成长和持续价值创造素质能力的目标状态或发展范式^⑧。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民营企业要在动态演进的环境中获得国内或国际的业内持续竞争优势,而这种持续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感知并抓住新机遇,重新配置和保护知识资产、能力和互补资产的动态能力^⑨。如果将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解为民营企业与环境共同演化、动态匹配、更新战略,从而提升动态能力、获得业内持续竞争优势的动力、过程与范式的话,那么,可以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构建有关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管理学研究架构。

① 江必新、曹梦娇:《论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及其法治保障》,《广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② 赵丽:《“十四五”时期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中州学刊》2022年第2期。

③ 李雄飞:《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经济问题》2023年第3期。

④ 赵一龙、彭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1期。

⑤ 林昌华:《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战略导向探究》,《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⑥ 闫爱青:《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视角》,《经济问题》2022年第10期。

⑦ 余泳泽:《通过产业政策优化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应用经济学评论》2024年第1期。

⑧ 黄速建、肖红军、王欣:《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0期。

⑨ Augier M., Teece D. J.,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the Role of Managers in Business Strateg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9, 20(2), pp. 410-421.

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如何与所处环境动态匹配、重构和整合从而获得动态环境下的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是战略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①。企业需要根据市场、环境和技术变化重新配置和更新已有资源从而获得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企业建立和更新资源和资产的组织能力即为动态能力^②。动态能力使企业有能力敏捷地感应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有动力对外部变化作出适应性反应,更新与重新配置企业的资源以与环境动态匹配,对战略进行变革以使企业动态地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③。

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出有着其特殊的经济、技术、社会和国际背景,这种背景反映了民营企业发展的战略性、关键性外部环境的变迁^④,反映了环境、技术、制度、市场的转折性、跳跃性、非线性动态变化,这种环境变化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不定向性、动态性和复杂性,反映了民营企业处于充满波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VUCA)的超竞争环境之中^⑤。

从经济背景看,一是经济发展范式发生重大变化。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度发展,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全要素生产率停滞甚至下降、资本边际产出下降^⑥和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等的挑战,原来那种主要依靠大量的要素投入和快速的产能扩张来实现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范式,在资源利用效率、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优化、可持续性约束下和高基数基础上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的经济发展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原来的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一以贯之的重大任务与发展要求。高速度发展范式与高质量发展范式的本质区别在于:高质量发展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衡量和推动发展,寻求多元动态发展目标的内在统一逻辑^⑦。相对高速增长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至少要求在发展思想、发展动力、发展方向、发展重点、发展速度、发展方式等方面发生变化^⑧。相应地,民营企业要适应经济发展范式的变迁,在企业的发展思想、发展动力、发展方向、发展重点、发展速度、发展方式等方面也要发生适应性变化。二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坚持和全面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夯实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意味着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① 焦豪、杨季枫、应瑛:《动态能力研究述评及开展中国情境化研究的建议》,《管理世界》2021年第5期。

② Teece D. J., “Explicat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 Nature and Microfoundations of (Sustainab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28(13), pp. 1319-1350.

③ Chen E. L., Katila R., McDonald R., et al., “Life in the Fast Lane: Origins of Competitive Interaction in New Vs. Established Market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31(13), pp.1527-1547.

④ 黄速建、肖红军、王欣:《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0期。

⑤ Bahuroglu O. N., “The Vortical Environment: The Fifth in the Emery-Trist Levels of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Human Relations*, 1988, 41(3), pp. 181-210.

⑥ 江飞涛、武鹏、李晓萍:《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5期。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黄群慧、原磊等:《新征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与政策》,《经济研究》2023年第9期。

⑧ 黄速建、肖红军、王欣:《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0期。

⑨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第13页。

从社会背景看,一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二是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老龄化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影响着消费需求和劳动力市场,企业需要适应这些变化,以优化人力资源管理和市场策略。三是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和要求大为增强。全球范围内对环境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高质量发展要求企业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企业不仅要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还需承担社会责任,需要关注利益相关方和社会的长期价值实现。四是社会期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增长更加普惠、更可持续,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从技术背景看,数字化、智能化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加速推进,全球的经济社会都正在迅速地推进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大数据、超级宽带、激光技术、云计算、区块链、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3D打印、新材料等一系列新兴制造技术、使能技术、制造工具以及相应的新的制造系统正在深刻改变着企业的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推动着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新优势的形成与发展,创新成为企业在竞争中获胜的核心要素。新的工业革命是一种技术制度的变迁,这种变迁构成了企业发展环境的战略性变化,要求企业的发展进行情境转换和发展范式变革,从在原工业革命背景下以大规模要素投入、规模扩张驱动的发展范式,转变为智能化工业革命背景下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范式。

从国际背景看,一是逆全球化趋向与贸易摩擦。尽管全球化趋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逆全球化趋向泛起,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与打压,构筑贸易壁垒,推翻了全球化、比较优势等理论的假定前提,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运营带来严重挑战。二是全球供应链重构。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构,企业需要灵活应对供应链的变化,确保生产和供应的稳定性,探索多元化的国际市场。三是国际竞争加剧。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要求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标准的符合性,以在全球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基于对企业异质性战略资源进行动态整合、构建和重构的突出的企业动态能力,是企业成长甚至世界一流企业成功的基因^①。高质量发展范式要求民营企业跳出由以往经验与成功所带来的资源陷入、认知局限和行为惯性组合的路径依赖^②而形成的“惯性陷阱”,解决由路径依赖所带来的群体思维、认知锚定、黏性和组织弹性缺乏^③、资源惰性和惯例惰性^④等一系列问题,破除民营企业基于以往经验与成功的固有行为模式和心智模式的核心能力“刚性”^⑤。民营企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在动态环境中与环境共同演进,按照组织环境适应理论所提出的“刺激—反应—效果审查—适应函数修正”方式对外部环境变化作出响应^⑥,进行适应性的变革,通过组织调适以与环境动态匹配,整合、构建和重构企业内外部资源,突破路径依赖和既有市场位势,变革企业的战略,从而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约束下,形成和保持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并提升综合绩效,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① 黄群慧、余菁、王涛:《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国际经验与中国情境》,《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11期。

② Sydow J., Schreyögg G., Koch J., “Organizational Path Dependence: Opening the Black Box”,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9, 34(4), pp. 689-709.

③ Arthur W. B.,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Economic Journal*, 1989, 99(394), pp. 116-131.

④ Gilbert C. G., “Unbundling the Structure of Inertia: Resource versus Routine Rigid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48(5), pp. 741-763.

⑤ 柯达、诺基亚等都是典型的“成功反被成功误”的核心能力刚性案例。

⑥ 黄速建、肖红军、王欣:《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0期。

民营企业从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范式是民营企业对环境变迁、制度变迁的适应性变革。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与其他企业互动、与环境互动中产生了企业内生性的变异选择和自适应变异选择,这两种变异选择的结果是形成由追求综合效率提升这一内生动力引致的动态能力更新、提升需求,和由各种制度、环境变迁等外部动力引致的动态能力更新、提升需求。民营企业发展范式转换是高质量发展范式形成、替代或改变高速度发展范式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是以更为适应企业动态环境的、整合和重构企业内外部资源、革新企业战略,形成更能够使企业获得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效率更高的动态能力或预期获得更强持续竞争优势、效率更高的动态能力,更新、替代原有动态能力的过程。面对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企业为了获得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以提升和保持企业的综合绩效,与原有环境相匹配的原有动态能力已经不能与环境相匹配,与企业期望的竞争优势和预期综合绩效存在较大差异时,就表现出动态能力的非均衡。企业原有的动态能力可获得的净竞争优势和净综合绩效小于新的与环境匹配的动态能力时,就出现了动态能力更新的盈利机会,诱致民营企业与环境共同演进,整合和重构企业内外部资源、变革企业战略,进行动态能力更新,以达成新的动态能力均衡。民营企业发展范式的转换,也是由外部环境变迁倒逼民营企业强制性动态能力更新的过程。

综上,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管理学内涵是:民营企业与环境共同演进,尤其是适应全面数字化转型的环境,快速应对外部制度、技术和市场的变化,整合、构建和重构企业内外部资源、革新企业战略,突破既有的路径依赖和市场位势,以更有利于企业获得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更高综合绩效的动态能力替代原有的动态能力。

在理论上将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抽象为民营企业动态能力转换,围绕民营企业动态能力转换与提升这一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管理学本质,需要讨论相关的四个核心命题:一是民营企业这一经济主体的组织性质;二是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环境共演性;三是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依赖性;四是民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态能力独特性。

三、民营企业的性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的性质是什么?即民营企业是什么样的组织?这是讨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性理论问题,对于发展民营企业的必要性、民营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民营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民营企业发展前景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分歧,都与对民营企业性质的认识分歧相关联。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的性质,对于进一步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应有功能、履行民营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建设中的使命与任务、构筑更强的动态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所有生产资料都要由国家所有,要“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1949年以后,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和所有制理论,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②,当时的民族私营企业均被改造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自1954年起,国家有计划地发展公私合营企业,把它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形式。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赎买的方式,在经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一系列从初级到高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4页。

②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指经由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使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

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后,至1956年底,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①。全行业公私合营后,采用定息方式,即按照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共23亿余元)每年发给资本家5%的股息,共发10年。这就使得私股与生产资料的使用权相分离,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运用。定息停付后,企业就完全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到1979年止,全国工业领域均为国有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1980年非公有制经济才在工业总产值的统计中出现,占0.49%^②。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私人投资、国有企业改制、集体所有制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改制、国有与集体非控股或非控制式与非国有联营等多种路径建立与发展了民营企业。自1980年12月11日,温州的章华妹获得了浙江省温州市工商局颁发的全国首个“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1984年4月13日,姜维获得当时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营业执照,至今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多,2024年全国共有29家民营企业进入世界500强。

在实行了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种单一的公有制以后,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又要建立、发展民营企业呢?中国建立和发展民营企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是什么?

建立与发展民营企业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1949年以后,中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内的单一公有制。面对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经济落后、基础薄弱、国际封锁的时代基点与环境,计划经济体制以及这种体制下的单一公有制经济是民族独立与自强的唯一经济基础,对于中国经济的恢复与振兴、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工业化尤其是重化工业化的推进、较快地缩短了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快速发展国防工业并带动其他相关行业发展、民生的保障、重大的技术突破、国家安全保障等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公有制安排对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直至1978年中国整体经济实力还是十分薄弱,GDP总量和人均量都极低,尤其是公有制企业的经济效益较差。实践表明,由政府来代替市场并充当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公有制安排,并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升。社会制度、社会形态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目的是极大地发展生产力,实现生产力发展的“卡夫丁峡谷”跨越才是最根本的目的^③。实现这种跨越的具体表现应是对发达国家的超越和更持续、更快速、更健康发展。这更加符合马克思社会形态发展的理论以及对未来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科学设想。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力。但这种优越性在一定时期内还没有得到应有、充分的发挥,没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公有制和单一按劳分配的生产关系安排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未能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未能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④。这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和发展民营企业提供了实践基础。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依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作出了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与发展,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于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基本原理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和分配理论也进行了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与发展,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为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建立和发展民营企业提供了理论

①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http://www.cppcc.gov.cn/2011/09/26/ART11317001118812343.shtml,访问日期:2024年6月26日。

② 胡叶琳、黄速建:《再论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与功能》,《经济管理》2022年第12期。

③ 胡叶琳、黄速建:《再论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与功能》,《经济管理》2022年第12期。

④ 项安波:《重启新一轮实质性、有力度的国企改革——纪念国企改革40年》,《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基础。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与发展民营企业首先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基本原理的实践,是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践。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不仅要依靠公有制经济,也要依靠民营经济,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与发展民营企业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高质量地发展中国的经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国家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力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要“肩负起更大使命、承担起更重责任、发挥出更大作用”^①。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是共生共荣共同体的关系,是互为生态的。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任务与期望。要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各种赶超,尤其是要打破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卡脖子”,实现技术赶超,也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力量。民营企业是实现技术赶超的关键性力量之一,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重大原创技术突破、成为产业链“链长”的关键性力量之一。民营企业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生力军,应当且已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作出积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一规定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民营企业是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一种组织形态,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以民营企业为载体的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要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②。民营企业要作为保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物质基础,作为国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物质基础,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力量。

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环境共演性

根据企业行为理论,企业作为一种适应性组织,存在着外部的扰动或者冲击,企业无法控制这些扰动或冲击,而企业存在一些内部的决策变量,企业可以根据一定的决策规则去控制这些决策变量,外部冲击和企业内部决策变量的每一种组合都将改变企业的状态^③。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应然性来自于外部环境的扰动和冲击,企业为解决内在发展难题、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提升综合效率,须应对这种扰动和冲击,作出适应性反应,否则就会在环境的扰动和冲击下被淘汰。这种适应性反应就是与环境共同演进,快速适应外部制度、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环境变化,整合和重构企业内外部资源、变革企业战略,更新企业的动态能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就是提升动态能力的过程,提升动态能力的过程就是对环境作出适应性反应、与环境共同演化的过程,提升动态能力的本质是企业对环境做出适应性反应。

自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发展,民营企业的关键性、战略性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关键性、战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第6页。

②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页。

③ 西尔特、马奇:《企业行为理论》(第2版),李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3—104页。

略性环境变迁决定了民营企业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发展阶段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制度;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时代新要求;国内、国际多数领域竞争日趋激烈、中美科技博弈越演越烈、逆全球化的竞争新态势;新工业革命引致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形成制造新范式;社会主要矛盾、社会结构、社会期待变化的社会新背景;民营企业为摆脱“低端锁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新需求;等等,共同构成了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变迁的新情境、新集合、新趋势。民营企业需要适应这种新阶段、新制度、新格局、新要求、新态势、新范式、新背景和新需求,整合和重构企业内外部资源、变革企业战略,进行动态能力更新,从而获得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

经济发展阶段从高速度发展向着高质量发展的转换,要求民营企业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改变原有那种主要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规模快速扩张和低成本竞争获取市场份额从而实现高速度发展为主要路径的主导性发展思路与战略,转向发展质量提升和运营效率提高的主导性发展思路与战略,实现以高质量、高效率发展为基础或前提的一定速度的发展。

新阶段、新制度、新格局、新要求、新态势、新范式、新背景和新需求的环境集合,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意味着:

1. 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与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意味着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将得以进一步持续优化,国家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将继续支持和保护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确认和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将受到更好的保护,市场准入和营商环境有望持续优化,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更多的发展机会。政府将“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①。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合规政策支持力度将会更大。市场机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公平竞争制度将更为健全,民营企业将在更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中参与竞争,更为公平地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发展空间,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2. 更为合规的经营。制度保障既包括“放得活”的激励性制度,也包括“管得住”的约束性制度。“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民营经济的市场性决定了其自发的发展受着市场或价格机制的引导,而单纯的价格机制引导不出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市场信号的价格边际性变动远不足以反映经济长期变化的结构性问题,市场机制不能自动实现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结构性重大变化^②。实现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坚持经济社会发展方向,需要有法律、法规、竞争政策、产业政策、经济性与社会性管制政策甚至是其他的一些机制来规范、执行。高质量发展伴随着更加严格的市场监管和政策导向,政府对市场秩序的规范将进一步加强。民营企业需要适应新的监管环境,遵守法律法规,确保合规经营。在一些新产业、新业态、新赛道或其他新经济现象中,为防止发展失序,从而影响公平竞争、冲击市场秩序,针对发展中已经出现或将可能会出现失序现象,将通过预见性或弥补性的法律、法规、政策去进行规范。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民营企业需要提升合规经营能力,加强对市场风险的监控和管理,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确保企业在法律和政策的制度框架内稳健发展,遵守国内外法律、法规和政策,确保经营活动合法合规。要避免在要素的获得、市场的准入或生产经营行为的其他方面打制度的“擦边球”,走灰色路子。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第14页。

② 路风、何鹏宇:《举国体制与重大突破——以特殊机构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的历史经验及启示》,《管理世界》2021年第7期。

3.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国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民营企业需要应对来自国内外同行在技术创新、产品质量和市场份额等各方面的强大竞争的压力,无论是从竞争焦点看,还是从竞争层次、竞争优势、竞争形式、竞争环境和竞争范式看,归根到底是企业动态能力的竞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民营企业更加关注国内市场需求,优化产品和服务结构,满足国内消费者日益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需求。同时,新发展格局下的国际市场对于民营企业发展依然非常重要,民营企业需要在国际化与本地化之间寻找平衡点。随着市场环境的优化和对外开放的深化,民营企业将面临来自国内外企业的更大竞争。同时,也有更多的机会通过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4.更不确定的国际市场和更为开放的对外经济关系。中美科技博弈和逆全球化趋势加剧了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民营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和角色可能面临挑战。经济全球化的一些基本假设实际上并不牢固,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例如,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国际分工理论。这些理论通常隐含了一个假设:国际贸易不受阻碍,不受国际关系或地缘政治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假设极不可靠。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增加,中国将继续扩大与全球市场的联系,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国际化发展的机会。这包括进入更多的国际市场、参与全球供应链以及获得国际技术和资本;民营企业需要确保其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安全与稳定,特别是在面对全球贸易摩擦和供应链中断风险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企业需要考虑供应链的多元化和本地化。在积极拓展国内市场的同时,民营企业也应继续开拓国际市场。企业可以通过全球化布局、多元化市场开发、品牌国际化等措施,提升全球竞争力。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企业需要增强合规意识,减少国际运营风险。

5.更为迫切的技术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国家战略,意味着民营企业必须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减少对外国核心技术的依赖,提升自主研发能力,解决民营企业的产业链、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问题。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也要求民营企业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储备。

6.更为必要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新一轮工业革命带来的数字化、智能化制造范式要求民营企业投资创办应用数字化、智能化制造范式的企业或对现有企业快速进行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采纳新的制造范式。企业需要通过数字技术、智能制造等手段,提升生产效率,优化供应链管理,打造智能化的生产和管理体系。

7.更可持续的发展。民营企业绿色发展、环保要求和社会责任变得更加重要,民营企业动态能力的构建包括了绿色发展能力,这种能力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基础性能力。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关注环境、员工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采用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减少碳排放、污染排放和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企业的公众形象和品牌声誉,实现企业的综合效益,关注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长期价值实现,从而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民营企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与这种环境共同演进,对环境作出适应性响应。作为对环境适应性响应的具体行为,民营企业要适应环境、更新和重新配置资源、更新战略,形成新环境下获得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动态能力。依据资源基础观(RBV),企业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的和不可替代的资源(VRIN)被视为企业获得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基础观框架中的企业资源通常被划分为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和特有资源。有形资源包括可以明确识别和估值的物理资产(如机械设备、建筑物、原材料和技术等)和财务资产(如现金、投资、信贷额度、资本获取渠道等)等;难以识别和估值但对企业竞争优势至关重要的无形资源和能力包括知识产权(如专利、商标、版权等)、品牌资产(如声誉、品牌认知度、客户忠诚度等)、组织文化(如公司价值观、企业文化、员工士气、公司规范等)、人力资源(如员工的技能、专业知识、经验和创造力等)、企业有效利用和配置资源以实现预期绩效的能力(如高效的生产流程、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运营能力)和企业特有资源(如路径依赖——随着时间

积累且是企业历史和经验所独有的资源;因果模糊——难以理解或解开因果关系且难以复制的资源;社会复杂性或社会资本——源自企业内部复杂社会互动的资源,如关系、信任和文化)。

尽管战略管理理论认为,资源基础观以及基于资源基础观的核心能力理论属静态视角,动态能力理论拓展了资源基础学派的静态研究视角,从演化角度解决了能力学派的核心能力刚性问题^①,但动态能力理论要求企业要在动态的环境中与环境共同演进,更新和重新配置资源以应对环境变化,并未否认企业的动态能力形成需要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的和不可替代的资源,只不过从环境动态变化的视角,要求企业克服资源刚性,动态地更新和重新配置资源。企业异质性动态能力的形成源于动态地更新和重新配置的资源是否具有异质性,是否是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的和不可替代的。民营企业环境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其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所需要的基本资源类型,但改变了资源的结构、质量、具体内容和配置方式。比如,数字化转型使得数据成为企业的资产;出现新的商业模式;企业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被数字化所赋能或变革;数字化、智能化使得企业的交互记忆系统进一步跨出企业的边界,外部记忆资源使企业群体记忆的能力得以增强;等等。

从整体经济发展层面看,由于基数效应的影响以及资源利用效率、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优化、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可持续性约束下,主要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进行规模扩张从而实现高速发展的范式难以为继,高速度发展很难与高质量发展相容。然而,从企业发展层面看,如果实现企业与环境共同演进,通过整合和重构企业内外部资源、变革企业战略,获得与企业发展环境相匹配的异质性动态能力,民营企业完全有可能实现高质量的高速度发展。企业发展层面的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度发展并不必然矛盾,二者可以相容。企业与环境相匹配,调整和重新配置自身的资源,通过战略更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转型升级,变革商业模式、管理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改变技术路径,形成新业态,进入新领域、新赛道,从而形成新优势,就能实现民营企业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的高速度发展。

华为和宁德时代都是典型的实现高质量的高速度发展的案例。这两个企业都展示了如何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下,与环境共同演化,通过技术创新、全球化扩展、高质量产品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和提升异质性动态能力,实现了基于高质量发展的高速度成长。

从动态能力三个维度来分析华为,则可以看到:(1)感知能力(sensing):一是前瞻性的技术布局。很早就开始在5G、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进行研发投入。二是全球化视野。通过在全球设立研发中心,感知全球技术趋势和市场需求;三是洞察客户需求。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深入了解电信运营商和企业客户的需求。(2)抓住机会能力(seizing):一是持续高研发投入。2023年研发投入达1647亿元人民币,全年收入的23.4%。过去10年中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了11100亿元人民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使得华为在ICT(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5G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数字能源业务以及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等前沿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二是实施人才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吸引顶尖人才,建立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三是快速的市场响应。能够迅速将技术创新转化为商业产品,如在5G领域的快速布局。(3)重构能力(reconfiguring):一是业务转型。从单一的电信设备供应商转型为ICT基础设施提供商、智能终端和云服务提供商。二是组织结构调整。实施轮值CEO制度,保持组织活力。三是供应链重构。面对美国制裁,快速调整供应链策略,开发自主芯片。

华为典型地表现出了高质量的高速度发展。从1987年成立时的21000元人民币,到2023年的营收7042亿元人民币。与2022年相比2023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64%,净利润870亿元,同比增长144.4%。2024年上半年,华为实现销售收入4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3%,净利润率13.2%^②。

① 焦豪、杨季枫、应瑛:《动态能力研究述评及开展中国情境化研究的建议》,《管理世界》2021年第5期。

② 《华为发布2024年上半年经营业绩》, <http://www.huawei.com/cn/news/2024/8/h1-business-result>, 访问日期:2024年8月29日。

华为通过在全球市场的扩展实现了高速增长,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市场收入占比超过50%,其产品不仅在新兴市场表现出色,即使在受到打压的一些发达市场也获得了显著份额。截至2023年底,华为在全球范围内持有超过14万件有效授权专利。华为具有全球领先的市场地位。

宁德时代(CATL)是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提供商。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2018年在深交所上市。2017年营业收入约199亿元,2022年达到3289亿元,5年复合增长率约75%。截至2023年底,市值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2023年宁德时代的营业收入达4009亿,研发投入是183亿,占营业收入的4.58%。截至2023年6月30日,宁德时代拥有6821项境内专利及1415项境外专利,正在申请的境内和境外专利合计13803项。2023年宁德时代在全球动力电池市场份额达到36.8%,连续多年全球第一。公司与特斯拉、大众、宝马等全球顶级汽车制造商建立了合作关系。

从动态能力三个维度观察,宁德时代的感知能力主要表现在:准确预见到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巨大潜力,早期就专注于动力电池技术;持续关注全球电池技术发展趋势,如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密切跟踪政策变化,如各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碳中和目标等。抓住机会能力主要表现在:快速扩大产能,满足爆发性增长的市场需求;与多家全球汽车巨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如特斯拉、大众等;大规模投资研发,保持技术领先优势。重构能力主要表现在:持续优化电池技术,如开发CTP(无模组)电池包技术,提高能量密度;拓展业务范围,从纯电动车电池扩展到储能系统等领域;积极布局全球化生产基地,如在德国建厂,适应不同市场需求。

这两家企业的共同点在于:都具有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都在各自领域保持技术领先,持续大额投入研发;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能准确把握行业趋势和用户需求变化;拥有快速决策和执行能力,能够迅速将想法转化为产品和服务;均拥有灵活的组织结构,能够根据市场变化快速调整战略和业务结构;都具有全球化视野,都能积极拓展国际市场,适应全球竞争环境。这两家实现了高质量、高速度成长的企业充分体现了动态能力理论的核心思想: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企业需要不断感知新机会,迅速抓住机会,并持续重构自身能力和资源,以保持持续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4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力有效支持发展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①。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都是高成长性的科技型企业,通常都是在一定期间内的高质量的高速度发展企业,这些企业一般都具有基于突破式创新或颠覆式创新所积累的主要资源及相应配置而形成的异质性动态能力。

五、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依赖性

制度是构成企业动态环境的重要变量,是引导、约束或者激励经济主体预期与行为的关键变量。企业动态能力的形成与提升是企业与包括了制度在内的环境互动、共演的过程,制度和组织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作用。制度会对企业的战略、组织结构与分工结构、新技术投资等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②。根据制度基础观的战略管理理论,制度对于企业尤其是转型国家企业的战略选择具有重大影响,制度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限制与组织所处的行业基础和组织资源一起影响了企业的战略选择,企业的战略选择是制度和组织互动的结果,同时企业的战略选择也影响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5236.htm, 访问日期:2024年7月30日。

② Cull R., Xu L. C., "Institutions, Ownership, and Finance: The Determinants of Profit Reinvestment among Chinese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 77(1), pp. 117-146.

着制度和组织^①。民营企业为获得与保持持续竞争优势,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形成与提升动态能力,而企业动态能力的形成与提升也受到其所面临的特定制度框架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约束^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③。制度是形成人类互动的约束,是人类创造的行为规则,制度通过提供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有效的制度通过鼓励生产性活动、降低交易成本以及提供创新和投资的激励来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经济主体的预期,减少不确定性^④,并对经济主体行为进行约束。制度是由一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的执行安排所构成^⑤,这三者的综合或合力对民营企业的动态能力及相应的经济绩效形成影响^⑥。

民营企业动态能力的形成与提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制度是民营企业需要与之共同演进的最为重要的环境因素,对民营企业更新和重新配置资源有着关键性、战略性影响。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执行机制都是民营企业发展最基础的、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制度安排,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更是受到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相关制度的完善程度和执行程度的影响,受到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执行机制变革方向和进程的影响。这种制度的完善与变革都不是民营企业能够自主决定的,而是依赖于企业外部整体的制度变革方向和改革进程。

民营企业在发展中存在着隐性规则、要素获取、路径锁定、冗余能力和综合素质等劣势^⑦,存在着市场准入的“暗规则”、要素分配上的“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⑧,存在着思想解放难、诉求响应难、要素保障难和服务享受难^⑨,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完善^⑩,对民营企业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认知偏见^⑪。有关的调研结果也表明:民营企业信心有待提高,惠企政策精准度、企业家知晓率和获得感有待提升,拖欠账款问题突出,政商关系存在“清而不为、亲而慢为”现象^⑫。

民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使得民营企业存在着若干制度性顾虑和担忧。是否显性、隐性地真正地将民营企业视作“自己人”?是否能够真正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是否能够保障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安全?社会上不时地会出现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有的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人提出所谓‘新公私合营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有的人说加强企业党

① Peng M. W., “Towards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Business Strategy”,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2, 19, pp. 251-267.

② Oliver C.,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Combining Institutional and Resource-Based View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9), pp. 697-713.

③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第10页。

④ 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⑤ 埃里克·弗鲁博、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姜建强、罗长远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5年,第4—5页。

⑥ 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邢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1页。

⑦ 王欣:《新时代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制度演进、现实刻画和未来进路》,《产业经济评论》2022年第4期。

⑧ 杨晓琰、郭朝先、张雪琪:《“十三五”民营企业发展回顾与“十四五”高质量发展对策》,《经济与管理》2021年第1期。

⑨ 贺姗姗、何建兵、张海立:《下大力气破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四大难题”》,《宁夏日报》2023年9月5日,第7版。

⑩ 周文、张奕涵:《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障碍与破解路径》,《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

⑪ 赵丽:《“十四五”时期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中州学刊》2022年第2期。

⑫ 马静、甘超平、吕忠瑞:《当前我省民营企业面临困难和问题调查研究》, <https://www.ishaanxi.com/c/2024/0812/3217790.shtml>, 访问日期:2024年8月12日。

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等等。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①。在要素获取、市场准入方面“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的存在,实际上存在的对民营企业的所有制歧视,一些地方存在的对产权保护力度不强、政府失信行为、政策执行落实不到位等等,引起民营企业对“自己人”地位、公平地位和财产安全的顾虑,导致部分民营企业家“小富即安”“大富不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②。

除了企业发展的一般性制度供给外,围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围绕“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③,着眼于增强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与保障,对于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式制度供给要具有六项功能性要求:

一是“立得牢”的功能。即制度上能够维护公平竞争,保障民营企业与其他企业“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在市场准入、要素分配、竞争参与等方面,民营企业能够得到公平对待。

二是“放得活”的功能。即制度要有助于搞好搞活民营企业,能够使民营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能够调动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和创新性来激发企业活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民营企业发展中的调节作用;能够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交融互嵌、互补的协同发展。

三是“管得住”的功能。即制度要有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价值理性、有序竞争和合规竞争。通过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市场监管政策和管制政策(包括前瞻性的管制政策)等,引导民营企业的有序发展,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民营企业之间形成有序的竞争格局与发展生态;引导民营企业规范公司治理、规范财务管理、履行社会责任、亲清政商关系、合规建设和廉洁风险防控、诚信经营;等等。

四是“担得起”的功能。即制度要为民营企业能力提升提供支持,使民营企业有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承担起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使命与任务,包括金融支持、财税支持、技术创新支持、人才引进和培养支持、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和与国有企业协同发展支持等等。

五是“撑得稳”的功能。即在制度上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性支撑。制度上要确认与保障民营企业的性质、地位与功能,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性,在制度上确认“三个没有变”“两个毫不动摇”“自己人”。在正式制度安排上确认民营企业是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一种组织形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自己人”。民营企业要作为保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物质基础,要作为国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物质基础,要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力量。

六是“落得地”的功能。即制度执行机制上能够使各项制度形成有利于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合力,且能够真正具体落实到位,使民营企业对于相关制度能知道、能相信、能获得。实现制度“落得地”功能需要正式制度中的各项制度的协同、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制度执行的协同、支持民营企业的制度与支持中小企业的制度协同,从而形成制度合力,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民营企业所面临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制度执行已经大步向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方向演进,但是,从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视角看,这种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执行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制度供给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①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0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黄群慧:《“十四五”时期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趋势及优化政策研究》,《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3期。

③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第13页。

1. 制度同步性不足。正式制度变迁与非正式制度变迁不同步。尽管作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具有强制性、普遍约束性和显性的正式制度还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落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现有正式制度安排的基本方向与目的,民营企业的合法性有着正式制度的保障。然而,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变迁并不同步^①,非正式制度作为具有非强制性、隐性和不成文特征的非正式规则与约束,会对经济主体的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与影响。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正式制度的保障,更需要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当显性的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式制度信号不足够强大甚至弱于隐性的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信号,正式制度的正当性就不足以抑制非正式制度的不正当性,就会形成制度替代现象,从而对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变迁不同步,二者变迁方向不同甚至是方向相反,在相当程度上引起了民营企业的制度性担忧,影响着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和预期。“原罪论”“离场论”“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所有制歧视等等,其实都是非正式制度的具体体现。隐性的非正式制度供给状况会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2. 制度效能一致性不足。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执行作用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制度信号与效能是一种作为矢量的制度合力,是这三类制度组成部分对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信号与效能的合成结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于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合力的方向就是两类制度合成之后形成的方向。如果两类制度不共线,则会偏离正式制度的方向;如果两类制度共线且方向相同,则制度效能可能是两类制度效能之和;如果两类制度共线但方向相反,则制度效能可能是二者之差,合力方向与效能强的制度相同;如果两类制度的效能大小相同、方向相反,则合力为零,即对于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没有效能。由于正式制度变迁与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不同步,甚至是非正式制度变迁远远滞后于正式制度变迁,造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协同性不足,而非正式制度对民营企业的心理暗示效能往往大于正式制度,且当非正式制度的制度信号与正式制度的制度信号不一致时,民营企业的信号采纳决策往往会遵循稳健原则。

制度执行是制度的组成部分,正式制度与制度执行也存在着距离。由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各种正式的文件等构成的正式制度安排中,并不存在歧视甚至否定民营企业的显性规则,但在实践中“非禁即入”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难以执行到位,形成审批许可“最后一公里”问题,阻碍民营企业准入的各种“门”的存在^②,反映的是正式制度与制度执行协同性不足,这种正式制度与制度执行的协同不足主要是受非正式制度影响造成的。“我们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但不少落实不好、效果不彰。有些部门和地方对党和国家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的大政方针认识不到位,工作中存在不应该有的政策偏差,在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③。制度执行中的所有制歧视、规模歧视、担心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导致“政治不正确”、自由裁量权较大时或可执行可不执行时遵循稳健原则等等,造成了正式制度与制度执行的协同不足,影响了正式制度的落实到位,造成民营企业对正式制度的获得感大打折扣。

同时,民营企业多为中小企业,在正式制度安排中,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与促进中小企业制度的协同不足。作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在财政资金支持、金融支持、税收优惠、技术创新鼓励、人才引进和培养、市场拓展等多个方面,需要像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有特殊的政策与帮扶措施。但从所有制性质来说,民营企业最需要的可能不是特殊照顾、特殊帮扶和特殊政策,更不应该也不需要民营企业“法外开恩”,而是极其需要作为上层建筑重要方面的隐性的非正式制度,能够起到适应、促进民营

① 邹起浩、任保平:《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财经问题研究》2024年第2期。

② 杨晓琰、郭朝先、张雪琪:《“十三五”民营企业发展回顾与“十四五”高质量发展对策》,《经济与管理》2021年第1期。

③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3页。

企业这一经济基础发展的作用,极其需要公平对待、公平竞争的显性的正式制度与隐性的非正式制度以及制度执行,尤其需要向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向的非正式制度支撑。

非正式制度对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可忽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快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进程,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式制度安排,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但如果同样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意识形态)却与正式制度不同步甚至相背离,不适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那么就可能会不利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落实,不利于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由于各类正式制度之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以及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制度执行之间功效可能会存在不一致,所以,制定了各类正式制度以后,应该对各类正式制度,甚至是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执行进行功效一致性评价,以及时地发现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制度短板与不足,为调整与完善制度提供依据。

3. 制度功能误用。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具备“立得牢”“放得活”“管得住”“担得起”“撑得稳”“落得地”等功能的正式制度体系。这一正式制度体系中,可分为五类具体制度:增强民营企业发展公平性的基础性制度、提升民营企业发展能力的支持性制度、维护民营企业发展健康性的规范性制度、坚定民营企业发展信心的保障性制度和确保制度得以落实的执行机制。每一类制度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都有着不同的制度功能。基础性制度具有“立得牢”“放得活”的制度功能,支持性制度具有“担得起”的制度功能,规范性制度具有“管得住”的制度功能,保障性制度具有“撑得稳”的制度功能,而制度执行则具有“落得地”的制度功能。具备这些功能的制度要相互协同、相互支撑才可能发挥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效能,而不能互相替代或使用错位,更不能相互矛盾。例如,支撑民营企业地位合法性的保障性制度功能用于支撑民营企业竞争能力提升的支持性制度功能,这类制度替代现象就是制度误用。当具有不同功能的制度之间存在制度冲突,就会形成制度矛盾。例如,当支撑民营企业有序竞争与运营的规范性制度功能与支撑民营企业竞争能力提升的支持性制度功能存在制度冲突就会产生制度矛盾。用保障性制度或基础性制度取代支持性制度是无法提升民营企业的发展能力的,用支持性制度取代规范性制度也无法保证民营企业发展的健康性。实践中往往较多强调保障性制度和基础性制度,而对支持性制度强调不足。此外,制度执行也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完善的正式制度离开制度执行就都难以落实。如果用正式制度来替代有力的制度执行,如果强正式制度弱制度执行,那么即使正式制度再完善也无法得以落实到位。正式制度的功能的实现还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正式制度的功能无法取代非正式制度促进或者制约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功能。实践中也较多地强调正式制度的功能,忽视非正式制度的功能,或者实际上假定正式制度功能能够取代非正式制度的功能。制度矛盾、制度误用会减弱整体的制度效能,使得制度合力减弱,导致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导性制度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

为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除“落得地”的制度执行外,需要建立和健全以下四类正式制度:(1)建立健全“立得牢”“放得活”的增强民营企业发展公平性的基础性制度。要建立健全权利平等制度、机会平等制度和规则平等制度。第一,要确保民营企业在法律上享有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与其他企业同等的权利,包括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政府采购、经营自主权等;第二,要构建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使民营企业能够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平等获取资源和发展机会;第三,制定和执行统一的市场规则、行业标准和监管措施,避免对民营企业实行歧视性或差异性待遇。建立覆盖所有市场主体的社会信用体系,确保评价标准一致。建立透明、规范、公正的政府监管机制,消除歧视性政策和措施,确保政策执行的一致性。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审查并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

(2)建立健全“担得起”的提升民营企业发展能力的支持性制度。要建立健全包括金融支持、财税支持、技术创新支持、人才引进和培养支持、企业服务体系、与国有企业协同发展支持在内的支持性制度。建立民营企业的融资、财政支持、涉民营企业收费监管和减税降费、拖欠民营企业账款清偿、人力资源、技术创新、转型升级、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完善民营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与国有企业协同发展、规范涉民营企业行政检查、纾困帮扶政策和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制度。为民营企业形成和提升动态能力、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提供制度支持,从而为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使民营企业有能力“做大做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积极贡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承担起更重责任、发挥出更大作用^①”。

(3)建立健全“管得住”的维护民营企业发展健康性的规范性制度。建立健全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制度,防止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经营透明度,防范和化解内部治理风险,提高决策科学性;加强民营企业合规建设和廉洁风险防控,强化民营企业财务和税务透明度和合规性,减少税收风险和财务不规范行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保护员工权益、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建立健全企业诚信档案,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建立和完善信用评级和信用管理体系,推动企业诚信经营,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4)建立健全“撑得稳”的坚定民营企业发展信心的保障性制度。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在明确民营企业合法性的基础上,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权益、公平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财产安全。还要有政策稳定性保障、政企沟通机制、舆论环境优化制度、政商关系规范制度、政策执行监督制度、政务服务优化制度。

六、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态能力独特性

异质性动态能力会带来更高的贡献潜力、独特性和更高模仿成本^②,动态能力的异质性越强,其对企业绩效的贡献程度越高^③,这意味着高质量发展的民营企业,其动态能力异质性会更强。然而,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动态能力存在着整体独特性吗?由于在相同制度下各民营企业与环境共演、更新与重新配置企业内外部资源水平存在着差异,动态能力或强或弱都存在着异质性,但在中国的特定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作为所有制性质相同的企业类别,其动态能力具有独特的整体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灵活性、市场性、营利性、战略性以及自发的生态性。

1. 灵活性。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在企业的决策效率、环境适应性以及运营执行上得以充分体现。这反映了民营企业更能够快速响应外部环境变化,具有更强的感知能力和抓住机会能力。

从决策效率看,民营企业的所有权通常集中于创始人或家族成员,权力高度集中。这种集中的治理结构使得决策过程相对简化,能够快速响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在面对市场波动、政策变动时,决策链条较短,企业能够迅速作出反应。从适应性看,灵活性还体现在企业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上。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政策调控,民营企业具有较强的调整能力,能够迅速优化生产、调整市场策略,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以适应环境变化。从运营执行灵活性看,民营企业的运营模式通常较为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第6页。

② 焦豪、杨季枫、应瑛:《动态能力研究述评及开展中国情境化研究的建议》,《管理世界》2021年第5期。

③ Drnevich P. L., Kriauciunas A. P., “Clarifying the Conditions and Limits of the Contribution of Ordinary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to Relative Firm Perform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32(3), pp. 254-279.

灵活,不受制于烦琐的行政管理体系,能够更高效地实施创新、组织内部资源调度,优化生产流程以提升竞争力。

2. 市场性。民营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高度市场化,其动态能力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不断得以形成和优化。民营企业天然地就是在竞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多集中在纯粹竞争领域,民营企业通过适应市场需求、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持续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种市场化特质使得民营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灵活调整战略和经营策略,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具有更强的重构能力。民营企业的发展路径是以市场为导向,其创新活动更多地受到市场需求驱动。民营企业在竞争压力下,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管理创新,形成动态能力,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3. 营利性。营利性是民营企业的核心目标,尽管民营企业也需要履行社会责任,但其主要关注点仍在于经济效益的实现。利润最大化是民营企业的核心目标,强烈的盈利导向推动了民营企业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以实现利润的持续增长。这种导向促使企业更加积极地寻求创新和效率提升,强化了抓住机会能力和重构能力。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其经济绩效的优劣。因此,企业的决策往往基于对成本、收益和风险的细致评估,力求在市场机会与风险之间取得最佳平衡。尽管民营企业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但这一责任的履行往往与企业的经济利益相结合,社会责任的履行通常以提升企业声誉和品牌价值为目的,以此最终促进企业的盈利目标。

4. 营利性基础上的战略性。民营企业的战略性不仅体现在追求经济效益上,还需在国家战略与市场机制的交织作用下进行灵活调整。民营企业既要追求经济效益,又需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方向。这一战略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在营利性目标与国家政策要求之间的平衡,实现企业发展战略的国家战略嵌入。民营企业需要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国家战略导向。这种平衡反映了企业在复杂制度环境中更强的战略适应能力。

民营企业的战略更多以市场为导向,在国家战略的总体框架下,充分考虑市场机会,积极参与竞争,谋求更高的市场份额和经济收益。战略更新时,企业会充分结合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和竞争态势,以确保战略的灵活性与有效性。民营企业具有较强的战略调整能力,根据市场和政策变化,能够迅速调整其经营方向、产品线及业务模式,展现出更高的战略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使其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政策变化中保持活力和竞争优势。

5. 自发的生态性。民营企业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自发形成有效的商业生态系统。这种能力反映了企业在复杂网络中的协作和创新能力,是动态能力在更广泛系统中的体现。

民营企业的发展通过市场机制自发形成企业间的生态系统。这种生态系统由市场需求和竞争压力推动,企业通过合作与协同发展,增强其在市场中的综合竞争力。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通常会自发形成基于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和产业链的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通过资源共享、信息交换和战略协作,形成互补性的市场网络,提升各自的竞争优势。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民营企业能够迅速调整其生态系统的组成和结构,例如调整合作伙伴关系、优化供应链体系等。这种自发的生态性不仅提高了企业的适应能力,还促进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灵活性和抗风险能力。民营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往往与其他企业、科研机构,甚至是竞争对手建立合作关系,形成创新驱动型生态系统。通过协同创新,企业能够降低创新风险,提升创新效率,并加快产品和技术的商业化进程。

The Management Logic and Core Propositions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Huang Sujian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P.R.China)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s a crucial foundation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conomy. Private enterprises, as an organizational form that reflects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re independent market entities and serve as a vital material basis for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private economy, carried by private enterprises, is an inherent element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eans that private enterprises must gain a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a dynamically evolving environment, and this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arises from the enterprise's ability to perceive and seize new opportunities, realloc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and engage in strategic renewal through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or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co-evolu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rapid response to changes in external institutions, technology, and markets, integration, building, and reconfigur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 strategy. These steps are aimed at replacing outdated dynamic capabilities with those that are better suited to gaining and maintaining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higher overall performance. The necessity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stems from key,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the enterprise's internal drivers to resolv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improve overall efficiency. The proces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essentially the process of enhanc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which is a process of adaptive response and co-evolu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At the macroeconomic level, for various reasons, high-speed development is difficult to reconcile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f enterprises can achieve co-evolution with their environment, integrate and reconfigur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and transform their strategies to develop heterogeneous dynamic capabilities that match their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for private enterprises to achieve both high-speed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s also institutionally dependent. The institutions that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private enterprises must possess functions that ensure stability, flexibility, effective regulation, accountability, robustness, and proper implementation. The main institution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 execution that are not synchronized with formal institutional changes. To address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resolve issues related to institutional synchronization, enhance institutional consistency, and prevent the misuse of institutional functions. Additionally, there is a need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foundational institutions that enhance fairn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supportive institutions that strengthen their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normative institutions that safeguard their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guarantee institutions that reinforce their confidence. Along with this, an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mechanism for institutional execution must be established, along with informal institutions that are largely synchronized with formal institutional chang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ystem, the dynamic ability of private enterprises has the overall uniqueness of flexibility, marketability, profitability, strategy and spontaneous ecology.

Key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natur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Dynamic capabilities; Environmental co-evolution; Institutional dependence

[责任编辑:纪小乐]